

青年周恩来与天津《益世报》

○ 盖金香

五四运动期间，天津的爱国运动持续时间之长、斗争之彻底令人印象深刻，原因之一是有青年周恩来这样的卓越组织者，把优秀青年团结起来。天津《益世报》作为当时北方报刊中的佼佼者，在五四运动中也表现出坚定的立场。在周恩来主编的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被封的关键时刻，《益世报》承担起会报的印刷重任。后来，周恩来作为《益世报》的特约旅欧记者，为《益世报》撰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。回顾青年周恩来与《益世报》的密切交往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周恩来关注民族命运、深入思考社会问题、积极从事革命实践、走在时代前列的身影。

“救国不肯后人”

天津《益世报》创刊于1915年“双十节”^[1]，是以天主教徒为主、在雷鸣远神父推动下集资创办的日报，以“益世益民，爱国护教”为宗旨。自创刊以来，《益世报》即秉持独立、公正、自由的办报理念，旨在成为政治当局的诤友。1916年，法国军队占领天津老西开，《益世报》强烈谴责并呼吁北洋政府与法方交涉。1917年夏，京津冀遭遇水灾，《益世报》深度报道救灾行动，揭露舞弊行为，呼吁社会参与，显示出社会责任感，受到时人称赞。

五四运动爆发后，天津学生群体迅速响应。



《益世报》创刊号

随后，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相继成立。已从日本归来的周恩来也迅速投身于学生运动中。

天津《益世报》“救国不肯后人”，5月5日就在第二版专栏中详细报道了北京学生集会游行的情况，如“全体学生三千余人齐集操场，各人手持一小旗……以游行京师各街市，唤起同胞猛醒为宗旨”^[2]等，并详述了山东问题的历史渊源以及中国与日本交涉的过程。《益世报》还赞扬南开学校铭记“五七”国耻活动组织有序，理性表达爱国热情；深入剖析了天津市民抵制日货、小学生废弃日制铅笔等现象；天津是北方先进的工业城市，《益世报》对工人的爱国热忱也有所反映；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游行请愿和集会演讲也得到了《益世报》的关注，《益世报》称赞她们为女界谱写辉煌历史；该报

还通过28幅新闻漫画实时传递事件进展，抨击卖国贼；总经理刘浚卿还要求总编徐谦（季龙）发表时评，以舆论鼓舞士气。

1919年6月3日，北洋政府拘捕了北京街头演说的爱国学生，上海得到消息后自6月5日起开始全市罢课、罢市、罢工。《益世报》及时报道了上海的“三罢”情形，这对于唤醒天津工商界的爱国热情，鞭策商人以实际行动支持爱国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6月10日，天津实现全市商界总罢市和人力车工人总罢工。同日，北京的工人运动也顺利进行。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，显示出势不可挡的力量，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，并罢免了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等卖国贼，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。

1919年6月中旬，北洋政府决定在《巴黎和约》上签字，引起各界群众纷纷反对。天津各界联合会的领袖马千里（天津学界代表）、刘浚卿等人在6月27日火速进京参加向总统府的请愿，要求中国代表拒绝签字。此前，天津人民已连日举行罢课、罢工、罢市，并得到《益世报》的深度报道支持。在各界群众和海外华人的共同斗争下，中国代表于6月28日拒绝签字。

周恩来对《益世报》的期待与厚望

1919年6月底至7月初，学生以为释放被捕学生、挽留蔡校长和惩办国贼、巴黎和会代表拒绝签字等目的均已达到，有些松懈，但实际上山东问题没有解决，抵制日货、反对“安福派”等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刚刚开始。

天津学联会长谌志笃和副会长马骏找到周恩来，向他说明学生运动的情况，并请他主编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，周恩来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在五四运动走向消沉的关键时刻，周恩来排除万难，于7月21日创刊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。

创刊号上，周恩来呼吁青年改造旧社会与自我思想，参与群众运动；深入剖析局势，强调爱国斗争的长期性，提出长远的救国大计。他揭露反动者试图通过提前放假来瓦解学生的阴谋，指出学校是学生的根本阵地，坚决不能

离校。

会报出版后广受学生和群众欢迎，产生了巨大影响，稳定了天津学联的斗争策略，推动了斗争的持续发展。周恩来成为一个强劲的组织者，将优秀的五四青年团结在周围，形成了一个核心。

1919年8月，山东发生济南镇守使马良逮捕请愿学生、枪杀爱国回教徒马云亭等事件，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再次组建请愿团。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对“马良祸鲁”反应迅速，然而周恩来却发现《益世报》忙于报道直奉军阀的争斗，对山东事件不发声、不作为。于是1919年8月5日，周恩来撰文批评《益世报》：“我是爱《益世报》的，当着‘五四’运动后，《益世报》终算是‘敢于发言’，我们也很尊重他，但是总觉得他没有一定目标……”^[3]周恩来质问：“外交到这个时候，安福派闹到这样子，我们还不赶快用我们舆论奋斗吗？《益世报》天天却扭住吉奉私斗做大题目……我真百思不得其解。”^[4]第二天，周恩来又发表题为《再问益世报》的文章，再次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《益世报》负‘转移社会趋向’的责任，为什么每天总拿奉吉私争一件事纠缠不休？其余所发生比着这个大的事情，却不甚记载，移开国民的注意点，这里是否别有作用？”^[5]在同一份报纸上，周恩来还刊发《黑暗势力》一文猛烈抨击了专权、亲日卖国的封建官僚政客集团“安福”系。

周恩来连续两天对《益世报》进行批评，体现了他对《益世报》的期待与厚望。8月7日，周恩来又与他人联合撰写《讨马良》，严厉指责亲日派人物马良，并呼吁天津各界联合起来声讨马良。

8月9日，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还与天津各校刊物《醒世周刊》《南开日刊》《北洋日刊》《师范日刊》等，共同成立了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，联合起来共同展开对黑暗现实的斗争，并发表《讨安福派的办法》，提出要进行群众运动。

令人高兴的是，《益世报》也跟上来了。《益世报》从8月9日开始用大量篇幅来报道相关事实，和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等报刊形成合力，效果非常明显。



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

1919年8月23日，京津代表共计25人就“马良祸鲁”向北洋政府请愿，但请愿人员全部被反动军警逮捕。消息传回天津，各界爱国人士异常激愤。关键时刻，周恩来冷静地指出，这正是掀起爱国运动的好时机。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的“号外”很快印出来了，迅速把这一消息传播出去，呼吁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。《益世报》也对请愿活动进行了及时报道和评论，发挥舆论引导作用。

1919年8月26日、27日，天津各界联合会又两次派代表进京请愿，一时间京津请愿人数高达两千人。结果政府派了更多的武装军警保安队，增派了骑兵，将请愿人群驱散，并有多人受伤或被捕。为了继续救援被捕代表，28日，天津联合会第四次推举代表进京，包括周恩来、张伯苓在内的500人再次前往北京请愿。多次请愿加上舆论压力，迫使北洋政府于8月30日释放全部被捕代表。

《益世报》与觉悟社

1919年8月下旬，京中“全武行”^[6]促使学生们猛醒，他们进一步看到了封建势力的顽固和黑暗。为了更好地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，周恩来、郭隆真、刘清扬、邓颖超、马骏等20人

召开会议，于9月16日成立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。觉悟社成立后成为天津对敌作战的“大本营”和“引导社会的先锋”，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天津迅速发展。

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在觉悟社成立后继续发行，1919年9月19日，周恩来在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上发表了《杨以德又要兴风作浪》一文，历数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上任10个月以

来的各宗罪状，揭露了杨以德镇压天津五四爱国运动的恶行，向他宣战。

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影响力大，号召力强，辐射面广，切中要害，令反动派惶恐，反动派多次促其停办，甚至派出军警要求协成印字馆不再承印此报。1919年9月22日，会报被迫停刊。周恩来撰写《〈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〉紧要启事》，发表在《益世报》及各大报纸上，声明将继续出版。关键时刻，《益世报》拨出人工，承印了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，使报纸得以在1919年10月7日复刊。

天津“双十节”游行示威是“马良事件”的延续，是觉悟社组织的一项重大政治活动。当时的背景是，学生开学后，全国学联组织周恩来等学生代表继续到北京请愿，要求严惩山东军阀马良，结果部分请愿学生被捕。为了营救被捕学生，周恩来等紧急返回天津，于“双十节”当日组织了数万人参加的集会、游行、示威活动。

针对“双十节”游行示威被军警阻拦殴打的情况，《益世报》于10月12日紧急刊发“号外”通报消息，呼吁乡民起来支持学生。10月13日，一份由周恩来起草的《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》也在《益世报》发布了，宣布各校罢课；19日，又发表一篇题为《女界爱

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发布文告《严斥杨以德无理攻击学生运动》的文章。此外，还有《讲演团继续向市民和士兵进行宣传》等共计10余篇文章也专题来报道此事。

天津“双十节”的斗争情况引发全国强烈反响。天津学生之后还再次组织万余人前往直隶省公署请愿，并得到了全国学联等团体的响应。北洋政府最终不得不释放了被逮捕的北京请愿代表。

在此期间，《益世报》编辑还到觉悟社演讲。1919年11月1日，《益世报》总编徐谦和编辑包世杰赴觉悟社演讲“救国问题”。11月15日包世杰第二次到觉悟社，谈“对新思潮的感想”。

天津“九一八”运动是觉悟社领导的另一次著名的爱国运动，起因是抵制日货。1919年“福州事件”后，天津的抵制日货运动达到高潮，《益世报》就此刊登相关文电、报道40余篇。1920年初，北洋政府拟与日本直接交涉“山东问题”，天津的抵制日货运动再次高涨。其间，发生了学生被日本浪人殴打并爱国人士遭反动当局逮捕的恶劣事件。对此，1920年1月29日，周恩来等领导天津学生赴省公署请愿，提出驳回日本通牒、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、释放被捕代表等诉求，却遭到军警镇压，结果周恩来等被捕，50余人受重伤。

惨案发生后，《益世报》第二天即刊登《亡国惨剧又一幕》《“九一八”惨案综述》等文章，披露事实真相，后又刊登《南开教职员敬告各界书》，呼吁各界谅解学生的过激行为，并呼吁保障言论、集会、结社自由和释放被拘代表及学生；之后又刊登《天津学联上书北京政府》等将近20篇文章。

周恩来为《益世报》撰写旅欧通讯

1920年底，出狱不久的周恩来决定赴法勤工俭学，《益世报》邀请他担任旅欧记者。

抵达伦敦后不久，周恩来便发回了第一篇旅欧通讯。这篇写于1921年2月1日的旅欧通讯中，有他对欧洲的初步印象：吾人首次踏足欧洲大陆，映入眼帘的，是大战后欧洲社会所承

受的巨大冲击及其表面上的动荡不安。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呢？简而言之，就是生产力的匮乏和经济领域的恐慌……^[7]周恩来最后得出的结论：如果欧洲的危机无法避免并最终爆发，那么社会革命的浪潮将向东推进，我国不可能有例外^[8]。

而仅仅在到达欧洲后一两个月，亲眼所见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被社会主义革命吓得瑟瑟发抖，加上又研读了英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国家与革命》等大量经典著作，周恩来很快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。

在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一年的时间里，周恩来总共为《益世报》撰写了56篇通讯，总字数达25余万字，平均每两天多就发表一篇。文字内容丰富，见解精辟，注重时效，平易流畅。

1922年2月6日，周恩来在《劳动世界之新变动》中写道：“在劳动问题根本解决上……劳动界中人，都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应这个需要。”^[9]随后，他在欧洲参与创建中共党团组织，主编党的机关刊物《少年》，便不再为《益世报》写通讯。

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，走过30余载的《益世报》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回顾青年周恩来与天津《益世报》的战斗友谊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历史现场，看到青年周恩来的理想与抱负和他对国家、对人民的深沉情感。

注释：

[1]“双十节”又称“辛亥革命纪念日”，是为纪念1911年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的庆典。

[2]《山东问题之日益扩大》：载《益世报》1919年5月5日。

[3][4][5][7][8][9]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、南开大学编《周恩来早期文集（下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、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424页，第424页，第425页，第12页，第17页，第428页。

[6]“全武行”是指1919年8月，以马骏为总指挥的请愿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请愿示威，并同军警搏斗的事件。■

（作者单位：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）

（责任编辑 王双）